

中国学在印度

□ 郁龙余

(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,广东 深圳 518060)

[关键词] 印度 中国学 研究

[摘要]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近代。《辛格日记》(《在中国的十三个月》)是早期印度人对中国的宝贵记录。中国学在印度的真正兴起,应归功于诗哲泰戈尔(Rabindranath Tagore)。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成立,对印度中国学研究贡献巨大。中国学在印度的发展,得到许多著名人士的支持,如印度的甘地(M·K·Gandhi)、尼赫鲁(S·Nehru)及中国的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蔡元培、戴季陶诸公。随着中国学在印度的发展,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学家和优秀学术成果。而谭云山和师觉月(P·C·Bagchi)则用力最勤、成果最著。当代,印度中国学研究方兴未艾。

[中图分类号]G115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0-7326(2000)01-0120-04

印度的中国学研究,是近代以来的事。

完全以一个印度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,可以追溯到戈达达尔·辛格(G·Singh)和他的日记。辛格日记本身虽然谈不上对中国的研究,但它的出版,在中印近代关系史上非同一般。辛格是英国殖民当局派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一名印度士兵。他从开始就怀疑这次出兵的动机。对英军来华后的血腥杀戮、疯狂抢掠更是反感和愤慨。他是个低级士兵,没有公开倒戈,只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中国人,并将他耳闻目睹的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和中国人的惨状,用印地语写进了他的日记。回到印度后,他冒着极大危险,躲过英印当局的检查,以《在中国的十三个月》为书名,公开出版了他的日记。于是,在印度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。辛格在日记中写道:“中国人民是信佛教的,和印度人信的是同一种宗教。我们同是亚洲大陆上的居民,所以中国人也还是我们的邻人呢。他们的肤色、风俗、礼貌和我们的也没有很大的差别,为什

么神要降这样的灾难到他们身上呢?难道我们不倒应该去帮助他们吗?”^①这是反映中国当时社会的一部特殊作品。现在,这部日记成了印度中国学研究的宝贵资料。

1924年罗宾德罗那特·泰戈尔(Rabindranath Tagore)访华,他谈文说艺,论诗评画,还观看了梅兰芳的京戏《洛神》,实在是近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。其间,泰戈尔对我国古典诗歌十分赞赏,言说间常常对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的诗篇旁征博引,对他们创作意境之美、创作手法之高超,表示由衷钦佩。泰戈尔是通过英译本来学中国古典名诗的。英语是印度的通行交际语,所以我们相信,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印度学者通过英译本来欣赏中国作品,一定不在少数。这种情况,从泰戈尔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不过,情况已有相当的改善。印度文学家们已经从英文翻译了若干著名的中国小说,并对这些小说展开研究和评论。泰戈尔的侄子A·N·泰戈尔致力于中国五四新文学不同流派的研究,

夏兰(Vimla Saran)研究的重点是茅盾。在印度,鲁迅研究很受重视。1981年,尼赫鲁大学组织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大会,印度全国有三、四十位学者、作家和在校学生撰写论文。这在中印文学关系史上可以说是一件大事。

中国学在印度的真正兴起,应归功于泰戈尔。1918年,加尔各答大学第一个开设了中国语言和文学课程,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师,该校就将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巴克济(师觉月,P·C·Bagchi)送到越南、日本、法国去培养。1921年,泰戈尔成立国际大学,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,中国学在国际大学具有突出的地位,各个方面给予支持。学校还专门从法国聘请著名中国学家西尔万·列维(Sylvain Levi)为客座教授,专讲中国佛学。几年之后,中国学研究在印度不断得到发展,水平亦不断提高。如著名梵文学者克提莫亨·沈(Kshitimohan Sen)教授,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的研究,成了印度对中国学研究最深的学者之一。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后,赴印的中国留学生从无到有,逐渐增多。中国留学生是沟通中印的重要桥梁,他们一方面学习印度文化,同时为印度中国学的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。所以,甘地(M·K·Gandhi)、泰戈尔等人对他们十分钟爱。曾圣提是第一位赴印的中国留学生。他留印的动因是受苏曼殊的感召和泰戈尔的鼓舞。所以,他随着泰戈尔访华回国的脚步,来到了国际大学。后来,他又到了甘地创办的沙巴玛提真理学院,师奉甘地。甘地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,还给他起了一个梵文名字“圣提”(和平、宁静,shanti)。国际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在1937年中国学院建立之后,有了巨大进步。

早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,就曾

有人提出建立“中印学会”,泰戈尔说本有此意,但因当时条件尚不成熟,没有提出正式倡议,然而从此他一直惦记着此事。1931年,中国学者谭云山在拜会甘地时提出中印加强联系的想法,深受甘地赞同。后来,他又将此意告诉泰戈尔,发现他早有此意。于是,成立中印学会的设想变成计划。谭回国后也获得许多人士的支持和赞成,特别是蔡元培和戴季陶,支持最力。不久召开筹备会议,43名发起人中有谭云山、周谷城、太虚、梁漱溟、徐悲鸿等,另有蔡元培、戴季陶、于右任等24位名流作赞助人。1934年5月,印度正式成立“印中学会”,设在国际大学,泰戈尔任主席,尼赫鲁(J·Nehru)任名誉主席。1935年5月,中国南京成立“中印学会”,蔡元培为理事会主席,戴季陶为监事会主席。中国中印学会决定向印度印中学会捐赠中国图书,以助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图书馆。这批中国图书陆续运出,第一批就有6万卷。

中印学会工作计划中,一个重要项目是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。在泰戈尔等的大力呼吁和谭云山的四处奔走下,1937年4月,印度中国学院正式成立,这是中印近代文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,举行成立典礼那天,如同盛大节日,泰戈尔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,“我久盼着这个日子的来临,为我们的人民偿还从古已许下的宿愿,就是要维护我们印度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与友谊,这是在1800年前,我们的祖先,以无与伦比的忍耐和牺牲奠好了基础的。”②

谭云山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。从此,谭云山领导中国学院,取得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。在中印学会的组织和影响下,一批中国有志学者前往印度,如徐悲鸿、陈翰笙、常任侠、金克木、徐梵澄、吴

晓铃、陈洪进等。他们或讲学,或访问研究,与印度学者切磋交流,可谓极一时之盛。

在中国学者赴印的同时,印度学者也陆续来华讲学。1944年印度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访问重庆,他讲学的重点是中印古代思想和宗教。1945年,印度美学教授甘歌利应邀来华讲学,介绍印度艺术。1948年,印度政府派遣师觉月教授来华,作为设在北京大学的印度历史和文化讲座的首任教授。师觉月是印度的一位梵汉兼通的著名学者。他在学术上取得非常重要的成果,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四卷论著《中国——印度丛书》中。这些著作在印度中国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。他的《印度与中国:千年文化关系》最著名,分为8章,分别论述中印的古代交通、佛教往来、佛教在中国、佛教文学在中国、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、两大文明的比较等问题。在比较中印两大文明时,他谈了五个问题:(1)中国的天和印度的伐楼那;(2)中国的天子和印度的国王;(3)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印度的祭祖;(4)孔子的社会与政治思想;(5)道教与印度思想。

③

除了中国学院之外,设在德里的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,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。这个机构由著名学者拉古维拉(Raghrira)创立,他本人于1938年著成《罗摩衍那》在中国一书,此后在不断研究的基础上,他又出版了有关中国诗歌和绘画的论著。他的儿子罗凯什钱德拉(Lokeshehandra)博士子承父业,专心于中国文化研究,成果丰硕,成为享誉全印度的中国学专家。

巴帕特(P·V·Bapat)和戈克雷(V·V·Gokhale)也是印度的著名中国学家。戈克雷在国际大学学习后,又到德国海

德堡大学学习汉语和藏语,巴帕特则在美国学中文。他们都曾在浦那的费尔古森学院成立的研究中国学的中心工作,都从事梵文、巴利文和汉语、藏语佛教典籍的比较研究。

除以上学者之外,还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学研究颇有成绩,如白乐天(P·Pradhan)撰有《四分律第一波罗夷法与巴利律经分别部》,巴宙(Pa Chow)撰《撰集百缘经与百喻经》,萨蒂兰詹·森(Satiranjam Sen)撰《两部汉译医学著作》,拉马南(V·Ramanan)撰《龙树哲学研究》,冉云华撰《中国佛教编年》、《中国佛教兴衰》等等。

在中国赴印学者中,谭云山时间最长,成就也最大。他是中国学者的优秀代表,他的事迹传为中印现代文化关系史上的佳话。1924年,泰戈尔访华深深感动了年青的谭云山。1927年他在新加坡首次见到泰戈尔,并获得访问国际大学的邀请。经过一番准备。1928年9月,他来到印度。在国际大学,他在研究学习佛学和印度文化的同时,开设中文班,教授中国文化。后来他筹建并长期主持中国学院,同时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有所开拓。他的研究涉及佛学、哲学、文学诸方面,成果丰硕。他终老印度,一生写了38种英文著作和10多种中文著作,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学术遗产。印度学者雷易(H·P·Ray)这样称赞道:谭云山教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,“他牺牲了有利可图的生计,参加了伟大诗人泰戈尔所致力的工作——加强喜马拉雅山的两个孪生子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纽带。他进行了不倦的努力,缔造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个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中心。……所有汉学爱好者都将以感激的心情怀念他的贡献。”④

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努力,印度的中

国学研究后继有人,方兴未艾。目前,开设中文课程的高等院校已有10所,除国际大学之外,尼赫鲁大学、德里大学实力最强,拥有一批有实力的中国学专家。而且,目前出现了中印联手培养的情况。如青年学者莉都·巴玛(Ritu Bhamra),她在北京学了两年中文,后回印度获得尼赫鲁大学的硕士学位,1994年又到中国读博士学位。她对中印古代神话研究所透出的学力,显示出中印联合培养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者是一条极好的路子。反之,也是中国培养印度学研究者的极佳途径。●

①史学双周刊社编《义和团运动史论丛》,三联书店1956年版,第112页。引自林承节《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,第52页。

②魏凤江《我的老师泰戈尔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,第133页。

③薛克翘《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,第210页。

④[印度]H·P·雷易《中国学在印度》,载《中外关系史论丛》第3辑,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,第246页。

责任编辑:陶原珂